

从《夏格巴日记》看十四世达赖喇嘛 1956年的印度之行^①

李荟芹

【摘要】 和平解放之初,西藏按照《十七条协议》稳步前进,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联袂进京,密切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印度政府担心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扩大,借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之机,通过与流亡分裂组织“西藏幸福事业会”合作邀请达赖喇嘛访印。对此,中央政府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达赖喇嘛访印。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说服下达赖喇嘛返藏,但达赖喇嘛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中印关系也开始由“热”变“冷”。文章试图通过《夏格巴日记》详细阐述1956年达赖喇嘛访印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 《夏格巴日记》;十四世达赖喇嘛;印度之行;1956年;西藏幸福事业会

【中图分类号】 D633.1+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9)01-0109-09

和平解放之初,西藏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稳步前进,1954年西藏与内地的运输线全线贯通,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同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联袂进京参加国事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内地的现代化激发了达赖喇嘛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的宏图大志,西藏正有序地融入共和国建设步伐之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印度政府担心中国政府在西藏影响扩大,于是,利用举办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的机会,积极谋划争取达赖喇嘛访问印度。1956年至1957年是达赖喇嘛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水岭,更是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由“热”变“冷”的一个转折点。

对于这一重大事件,国内藏学界一直有所关注。就著作而言,依笔者目力所及,较早关注此事的是丹增、张向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西藏》,指出中央接到印度政府的邀请信,持开明态度同意达赖喇嘛访印^②。杨公素在《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和《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两书中指出了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印的目的和企图,即试图“与中国西藏建立一种特殊的关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共对西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编号15XDJ003)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

系”^①，这主要是出于印度政府“担心中共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印度企图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②。随后，《解放西藏史》对达赖喇嘛访印事件的着墨明显增多，但主要侧重于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的思想变化以及周恩来对达赖喇嘛的三次规劝，并最终使达赖喇嘛决定返回西藏。对于达赖喇嘛访印的缘由，也仅提及“印度政府通过到拉萨访印的锡金王子，向达赖和班禅正式传达了访印的邀请。中央指示西藏工委，班禅、达赖可以去印度，(访印之事)听其来去自由”^③。而且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注意印度接待的礼遇，对达赖喇嘛、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西藏赴印人员的内部不和。^④就研究论文来看，数量相对较少，也主要侧重于周恩来三劝达赖喇嘛和最终达赖喇嘛返藏方面，如张双智的《周恩来赴印度三次规劝十四世达赖喇嘛》^⑤、王树恩的《周恩来在印度三劝达赖喇嘛回国》^⑥、陈永成的《在新德里三劝达赖喇嘛》^⑦等。

国内学界对于达赖喇嘛访印主要着墨于周恩来的“劝”和达赖喇嘛的“返”上，对达赖喇嘛印度之行的来龙去脉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达赖喇嘛访印是如何成行的？印度政府是如何联系达赖喇嘛的？达赖喇嘛对去印度是何态度？印度之行对达赖喇嘛本人的政治走向究竟有何影响？在美国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山雨欲来，1955—1957》^⑧里首次披露了《夏格巴日记》的主要内容。戈尔斯坦认为该日记是夏格巴作为“西藏幸福事业会”^⑨(以下简称“事业会”)“秘书长”的角色记载下来的“政治日记”^⑩。本文从《夏格巴日记》入手，力图还原这一事件的历史场景，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以期揭露印度政府策划达赖喇嘛访印事件的政治图谋以及产生的政治影响。

一、历史背景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达赖喇嘛、班禅联袂进京。在京期间，达赖喇嘛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年轻的达赖喇嘛愿意接受新的理念，甚至包括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思想，这也加深了他对贫穷落后的西藏进行社会改革的思考。他强烈地感觉到创造西藏美好的明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要在中央政府的带领下，极大地提高和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达赖喇嘛自己也声称这是他“最最得意的时候”，“在我从北京返回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信心，认为能够和他们好好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藏能够实现现代化”^⑪。北京之行后，达赖喇嘛的思想有了巨大进步，出现了积极与西藏工委合作的局面，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革西藏、发展西藏。但是达赖喇嘛的这一思想并不坚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印度政府既担心“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又希望“作为承认新政权(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藏的行动”^⑫，从而得以保持它从英国手里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某些特殊权利。承认新中国成立后，

①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②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③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解放西藏史》[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

④ 《西藏通史·当代卷》(上)[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⑤ 张双智：《周恩来赴印度三次规劝十四世达赖喇嘛》[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01—108页。

⑥ 王树恩：《周恩来在印度三劝达赖喇嘛回国》[J]，《湖北档案》2016年第1期，第42—44页。

⑦ 陈永成：《在新德里三劝达赖喇嘛》[J]，《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第30—33页。

⑧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⑨ 英文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Benefit of Tibet, 藏文为ཕན་འདེད་དོན་ཚཱུང་ལཱ་ཁང་།。西藏幸福事业会又称“哲堪孜松”或“藏人福利会”，是由夏格巴、嘉乐顿珠、洛桑坚赞等流亡印度的藏人组建的藏独组织。

⑩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79.

⑪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la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梅·戈尔斯坦著，吴继业译：《西藏现代史[1951—1955]——暴风雨前的宁静》，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0页)。

⑫ Hug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Rev. ed.: 1984, p. 179.

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长期推行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又在“自治区”内涵上大做“双轨政策”的文章。印度认知中的“西藏自治区”并不是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区,而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国家实体”。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基本上奠定了中印友好的局面,但“尼赫鲁希望用放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来换得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效”^①,为此尼赫鲁非常愤怒。更重要的是,青藏、康藏公路的全线贯通,达赖喇嘛的北京之行,动摇甚至瓦解了尼赫鲁政府关于西藏应该是一个软弱的缓冲地带的战略定位。于是,尼赫鲁政府准备借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之机,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印度,试图争取保持印度对西藏的影响,以确保印度的战略利益。

对此,印度外交部驻锡金政治专员阿巴·潘特(Apa Pant)有着精确的描述:“尽管我们放弃了在西藏政治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希望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印度和中国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承认印度在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利益。”^②另一方面,通过达赖喇嘛对印度的访问,印度还可以在中国领土之外了解和影响达赖喇嘛本人,从而抵消达赖喇嘛参加北京国事活动的影响。“印度方面之所以极力促成达赖喇嘛参加庆典,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外,大概应该受到美国和旅印藏人的影响,他们认为达赖喇嘛长期受到亲中共官员的包围,无法自由表达意见,只有来到印度,他们才可以影响并了解他个人的观点”^③。无论如何,印度邀请达赖喇嘛参加释迦牟尼涅槃纪念大会,含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目的,达赖喇嘛参会势必将提升大会的声望,但对于印度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抵消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国事活动的影响,让中国和世界看到印度在西藏“特殊”的影响力和利益。

锡金王室唯印度马首是瞻,在涉藏事务上具有特殊的作用。锡金原是中国西藏的藩属,与西藏之间的渊源深厚,锡金王室就逐渐成为了围绕西藏的各派势力之中的一股地位超然、特殊的势力,是各派、各国联系西藏地方政府的关键所在。他们很容易向外联系印度的外交官员、情报局成员和新闻记者等。甚至包括美国,想要了解西藏的情况也需要借助锡金王室的力量。因此,锡金王子常常受托出面来往于西藏地方政府与美国、印度官员之间。实际上,在达赖喇嘛访印的过程中,锡金王室就起到了穿针引线的特殊作用。

二、具体过程

为了寻求一条合适的邀请达赖喇嘛的途径,淡化这次活动的政治性,印度政府煞费苦心,在对各派政治势力分析研究后,开始与藏独组织“事业会”相互合作利用,还最终选择了地位特殊的锡金王子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面呈邀请函。

1. 达赖喇嘛在尚未见到锡金王子之前已获悉印度的意图

据《夏格巴日记》记载,1955年底,也就是达赖喇嘛北京之行返藏之后的半年,达赖喇嘛就已经知道了印度打算邀请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纪念大会的信息,也知道“事业会”是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机构联系的纽带。换句话说,达赖喇嘛在尚未接到锡金王子带去拉萨的访印邀请函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印度举办佛教大会的消息,更为重要的是达赖喇嘛知道印度政府和“事业会”不仅仅是以宗教的名义来邀请他参加佛教大会,更是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访印之行的,他们是把印度之行作为拉拢达赖喇嘛、争取西藏独立的一个重大机会来对待的。促成他的印度之行,既是“事业会”的目标,更是印度政府的意图。

“1955年12月1日,我(夏格巴)按照堪穷(洛桑坚赞)打来的电话起草了邀请达赖喇嘛的信函。”12月2日,夏格巴与堪穷一起去见嘉乐顿珠。然后随同锡金王子、彭康拉姜去见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阿巴·潘特,并报告了夏格巴起草的邀请达赖喇嘛的信件。“他们说,在信中你(夏格巴)也应该谈及印度学者怎样才能去西藏?西藏的翻译如何能来到印度?你也应该写上活动(佛陀涅槃)从5月开始,时间长达一

^①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58.

^② Pant, Apa. *Mandala: An awakening*. Bombay: Orient Longman, 1978, p. 120. (阿巴潘特:《曼陀罗:觉醒》,孟买:东方出版社,1978年,第120页。)

^③ 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龙在雪域——1947年以来的西藏现代史》[M],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年。”^①政治专员说对达赖喇嘛的邀请既来自摩诃菩提协会^②,又来自印度政府。这里透露出潘特企图让达赖喇嘛长期滞留印度的想法,因此在邀请信中让夏格巴明确写清楚佛教大会的时间长达一年。并决定通过锡金王子(此时王子尚未起身赴拉萨)给帕拉(卓尼钦莫,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副官长)发一封信。12月16日,“事业会”从达赖喇嘛的密电中获悉三大寺不反对达赖喇嘛访印,“藏人和色哲甘松(指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译注)将不会反对达赖喇嘛来印度”^③。以上日记内容,反映出帕拉、噶厦都已经知道印度政府想要邀请达赖喇嘛访印的意图。

1956年1月5日,达赖喇嘛发出一封无线电讯息,通过锡金政府的司机送达嘉乐顿珠,明确表达了其意图。电文称:“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内容知悉。因为诸多困难,我尚未确信[是否能够]赴印度。你们应当为国忧虑,无论眼前还是长远,要运用秘密方法来繁荣西藏政教大业。但是,有关绝密[事情],你们不能做的太多,也不能做的太少。至于信件联络,有很多内外障碍,暂时先停止发信来。”^④这则日记显示至迟到1956年1月5日,锡金王子还没有到达拉萨面见达赖喇嘛之前,达赖喇嘛就已经知道印度企图邀请他访印的信息,而且达赖喇嘛私下也表达了想要参加佛教大会的愿望,只是因为困难重重,所以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赴印,给了印度政府暗示,希望能够帮助减少困难,助其成行。事实上,1955年11月15日,印度总领事梅农就向班禅和达赖喇嘛提出邀请他们访印参加释迦牟尼纪念大会^⑤。达赖喇嘛确实在锡金王子没来拉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印度企图邀请他参加纪念会的意图。他也清楚印度境内的流亡组织——“事业会”所从事的分裂活动,但是他并没有设法阻止他们,更没有下令让“事业会”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实际上还让他们小心翼翼。

2. 印度政府委托锡金王子两次赴拉萨面见达赖喇嘛

印度政府之所以选择锡金王子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喇嘛,正是由于前文提及的锡金王室在西藏事务上的特殊地位。锡金王室出面能最大限度地掩盖邀请达赖喇嘛的政治意图,减少可能来自我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阻力,也不会引起美国人的不满,同时还能密切与“事业会”的联系,随时掌握达赖喇嘛的思想动向。1955年12月23日,锡金王子被印度政府作为摩诃菩提协会的特别代表派到拉萨,邀请达赖喇嘛赴印参加佛陀纪念活动。锡金王子到拉萨后面见了达赖喇嘛,并呈上了信函,称:“若达赖喇嘛以‘全球佛教大师’的名义参加此次世界佛教协会大会是当之无愧的,您的声誉必将大增。这将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好机会,请您接受邀请。”^⑥很显然,印度政府和“事业会”一开始就把达赖喇嘛访印当做是“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重大“机会”来对待的。1956年2月15日,锡金王子回复:“藏历十二月二日(公历2月14日)我拜见了达赖喇嘛,时间长达1小时20分钟。我把这边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达赖喇嘛明确想来参加佛陀涅槃纪念活动。”^⑦3月11日,洛桑坚赞说,“昨天,我与锡金王子短暂会面,他说……他两次在陛下屋里拜见了达赖喇嘛。陛下要他(锡金王子)‘请帮助住在印度并替藏政府着想的人’……[陛下]

① 1955年12月1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2.

② 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印度佛教复兴运动团体,系一国际性组织,又称摩诃菩提社、摩诃菩提协会、大菩提会,原名为菩提伽耶摩诃菩提会,是当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之核心团体。

③ 1955年12月16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p. 182—183.

④ 1956年1月5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4.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册(1955.7—1956.9)[Z],1991年,第458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⑥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p. 174—176. 原件存放在夏格巴自己的书房,原文为藏文草体。此信为锡金王子1955年12月23日赴拉萨时带给达赖喇嘛的。

⑦ 1956年2月14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7.

说,关于在印度为藏政府着想,并卖力工作的人,在那边,如果我不帮,谁帮?”^①

事实上,摩诃菩提协会向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发出的邀请信函,也就是锡金王子带去拉萨的信函,并不是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得知印度邀请达赖喇嘛参加纪念会后,中央鉴于西藏工作的需要,希望达赖喇嘛婉拒,并认为外国邀请应该与我国外交部直接接洽。中央认为“国外情况复杂、帝国主义活动很厉害,……如果出国,中央就很难照顾(达赖喇嘛安全)。同时因为西藏地方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也随时都需要你(达赖喇嘛),在这期间西藏僧俗人民都不愿你离开,因此还是不去为好。你可以以工作繁忙无法抽身,而且僧俗人民不愿你出国为由,婉言予以拒绝,并且应该指出,我国正如印度一样,一切国际方面来的邀请都必须通过我国外交部”^②。中央的态度和西藏工委的回复,通过锡金王子反馈到了印度。

3. 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

锡金王子去拉萨得到了达赖喇嘛想要参加佛教大会的明确表态,获得了达赖集团的一些重要官员的支持。根据西藏地方官员们的反馈,如果没有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函,中央可能不同意达赖喇嘛访印,或者还有可能派其他的活佛团来参加大会。“他(达赖喇嘛)必须有印度政府本身的邀请信……”^③因此,印度政府加大了外交周旋的力度。

《夏格巴日记》记载,1956年2月22日,夏格巴去见锡金政治专员(潘特),潘特提道:“到现在为止,印度政府已经与北京接洽三次提醒他们,但尚未得到回应。现在我要去德里,与印度政府讨论这个问题。4月初我将去西藏,届时尽力争取政府发出邀请函。印度政府将尽最大努力。”^④3月5日,“我们[事业会]肯定会邀请达赖喇嘛来,据王子说,他[达赖喇嘛]希望来访,而且尼赫鲁给周恩来发了一封措辞比较强硬的信”^⑤。事实上,此时,中央对达赖喇嘛是否要去印度参加佛教大会内部已经基本有所决策。1956年2月,毛泽东就曾对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陈毅说过:“达赖喇嘛是西藏的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⑥但是当时西藏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达赖喇嘛还暂时离不开,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接到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

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我国政府的正式回复,印度政府比较悲观,并得到了我国政府可能会派出除达赖和班禅以外的其他8位活佛团来参加佛教大会的消息。1956年4月4日,失望的尼赫鲁向下议院解释道“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收到印度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表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因为工作繁重不能出席……但是还说,因为中印两国在佛教上长期传统的联系,很乐意派遣一支由8名高僧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其中3名由我们提名”^⑦。从我国政府得到的消息显然让印度政府很失望,于是印度副总统及外交部长向北京呈送亲笔信邀请达赖喇嘛及班禅。

在漫长的等待中,印度政府甚至希望“事业会”能够获得一封达赖喇嘛请求尼赫鲁考虑帮助西藏事务的信件。1956年6月20日,潘特说:“你们(事业会)必须告诉尼赫鲁,达赖喇嘛希望来印度拜访尼赫鲁。如果你们能获得一封达赖喇嘛请求[尼赫鲁]考虑帮助西藏问题的信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将是非

① 1956年3月11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9.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五册(1955.7—1956.9),第458—459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1956年3月15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p. 190—191.

④ 1956年2月22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7.

⑤ 1956年3月5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88.

⑥ 《当代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

⑦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335.

常有益的”^①。不过,夏格巴认为让达赖喇嘛写这样一封信,一旦泄露出去会影响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否定了这个建议。6月28日,达赖喇嘛给中央去信提到访印事宜。7月12日,周恩来回复达赖喇嘛:“最近印度和尼泊尔都曾经邀请你去访问。我们同意你所作的答复,那就是,在原则上不排除将来去访问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西藏自治区在筹备期间工作重要,现在不能去。我们觉得,暂时这样答复是比较好的。因为,一方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确实需要你主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地注意到美、英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因此,关于你出国访问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慎重的和有准备的步骤”^②。

印度政府经过长达一年的谋划,终于在1956年10月1日,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我国政府发出了官方邀请信函,希望达赖喇嘛参加11月24日起为期3个星期的庆祝大会,并希望达赖喇嘛在印度可以多停留几天^③。可见,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否参加此次佛教大会问题上一直占据着主动权,也洞悉国外一些反动势力的分裂图谋,并始终保持着决策的清醒和慎重。

4、中共中央的同意最终促成达赖喇嘛访印

10月1日,印度政府发来官方邀请信函。10月2日,周恩来致信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信中说:“关于你们来印度的问题。当时中央考虑,如果你们愿意来的话,还是时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已经成立了,工作上可以离开;同时这次印度和尼泊尔邀请许多国家的佛教代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年,你们来参加佛教会议,可以和各国佛教代表见面,把我们和亚洲许多佛教国家的关系在已有的友好基础上加深一步,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④中央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印度参加纪念活动是持开放态度的,没正式答复的原因一是没有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二是防止分裂分子从中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中央政府之所以表示同意,是出于对西藏工作的全局考虑。第一,从国际情况来看,1954年中印签署友好合作协议,中印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中央政府对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置之不理,这会被印度视为是我国政府对他们不够尊重,甚至带有敌意,这也与中印关系的友好合作精神相违背。第二,中央政府如果不批准达赖喇嘛访印,则可能会被外界别有用心分子指责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名不副实。第三,虽然印度境内聚集了大批“藏独”分子、美国及国民党特务,但此时中印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一旦有事,足可通过外交途径转圜。第四,中央促使达赖喇嘛同意张经武返藏稳定西藏局势。毛泽东曾就此事写信询问达赖喇嘛意见,达赖喇嘛最终表示欢迎张经武返藏工作。

允许达赖喇嘛访印,回击了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质疑声,增加了我国在印度乃至亚洲佛教徒中的声望。当然,也彰显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西藏与达赖喇嘛正处于一个积极的状态。1956年11月31日,周恩来在印度与尼赫鲁总理会面时,向尼赫鲁总理清楚地表示:“中国政府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知道达赖喇嘛会在印度受到很好的接待,这样的出行可以增进宗教界接触……毛主席说中国佛教与其他国家的佛教应该有频繁的接触。这有利于增强藏传佛教的自信,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们同意达赖喇嘛与班禅到印度出行”^⑤。

11月25日,达赖喇嘛抵达印度,这是印度和“事业会”成员首次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直接面见达赖喇嘛,为他们游说达赖喇嘛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旅印的“藏独”势力如阿乐群则、嘉乐顿珠(达赖喇嘛二哥)、鲁康娃,以及受美国指派前来策反达赖喇嘛的土登诺布(达赖喇嘛大哥当才活佛)立即将达赖喇嘛

① 1956年6月20日日记,转引自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p. 199—200.

② 《给达赖喇嘛的信》(195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六册(1956.10—1958.12)[M],北京:中央统战部印刷厂,1991年,第51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1956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85页。

⑤ 穆史鲁尔·哈桑(Hasan, Mushirul)编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选集》丛书2第36卷[C],新德里,2005年,第596页。

包围起来,向达赖喇嘛灌输“藏独”思想,并要求达赖喇嘛留印领导“西藏独立运动”。12月,夏格巴向达赖喇嘛递交了一份请愿报告,要求达赖喇嘛领导西藏的“独立事业”,并妄称:“既然脱离了强权的压制,如果再从印度地区仍然回到强权底下,不仅不能恢复西藏的独立,而对皈依主上的生命安全一刻也难以放心,因而在西藏没有完全恢复独立自主前,希望皈依主上及随行人员留在印度的任何一个地方,以便就恢复西藏的独立问题,向联合国申诉苦衷,及图谋其他一切文武办法,由西藏的真主皈依主上亲自裁夺。”^①亲情的拉拢对达赖喇嘛影响很大。达赖喇嘛后来说,“我总的感到他们(指印度和“事业会”)对我们‘拉’的力量很大”,“现在主要的是随行官员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西藏时只听到一面的话,看到一面的事,想法亦较单纯。这次出国后接触了许多原来在此的西藏人,他们只说坏的,不说好的,使这些随行官员的思想被扰乱了”。^②在印度期间,达赖喇嘛甚至提出了“在西藏以和平方式赢得自由前,他想一直待在印度”^③。

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进行了会谈。尼赫鲁虽不想看见西藏团结的局面,但是显然他认为印度和中国西藏的关系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关系重要。他明确表示:“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许来到印度的中国西藏人进行颠覆和危害中国主权的政治活动。达赖、班禅两喇嘛将由原路返回西藏。”^④周总理设身处地,循循善诱,先印度总统、后达赖喇嘛、再随行人员,层层争取,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最终消除了达赖喇嘛对西藏局势的疑虑,没有了身边人的鼓动,断绝了对印、美支持的幻想,达赖喇嘛权衡再三后决定返藏。

三、后果及影响

1956年至1957年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是印度政府蓄意策划的、旨在分裂西藏上层人士、破坏中共对西藏上层统战工作的阴谋。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共成功挫败了印度与“事业会”的阴谋。但是这次印度之行,对达赖喇嘛的思想以及未来西藏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了中印关系由“热”变“冷”的分水岭。

1、达赖喇嘛思想上逐步滑向了“藏独”的立场

1954年达赖喇嘛与班禅联袂进京,是一次颇具意义的成功,达赖喇嘛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并开始积极与西藏工委合作。然而,印度之行后,达赖喇嘛与印度境内反动分子联系日益密切,思想发生变化,变成表面上与西藏工委合作,实际上和印度噶伦堡的“事业会”“西藏人民会议”合作的局面,极大地影响着此后达赖喇嘛的思想走向和西藏政局的发展方向。

返藏后,达赖喇嘛曾说“这次出国访问,在印度的藏族官员和一些随从人员思想上有些混乱,也影响了我的思想,绕过了许多暗礁,最后总算回到拉萨来了”^⑤。达赖喇嘛的上述表态,一方面表明他个人性格和立场的两面性的特点,另一个方面确实反映了达赖喇嘛印度之行斗争的严酷形势,也从一个反面表明了争取达赖喇嘛返藏,周恩来总理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反分裂斗争的伟大胜利。

但不可否认,达赖喇嘛内心的变化也显露了蛛丝马迹。返藏前达赖喇嘛曾两次发信函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最终遭到中央的拒绝而流产。但是达赖喇嘛想借助印度政府来牵制中央的想法则是显而易见了。1957年1月15日,噶厦在印度加尔各答召集了有噶厦“西藏人民会议”“事业会”参加的会议。会上,首席噶伦索康代表噶厦政府发言,他先说明了达赖喇嘛已经决定返回西藏,但是接着说西藏未来的事情会有所不同,而且,噶厦“西藏人民会议”“事业会”会团结起来,共同协作。经过讨论,噶厦和流亡人

^①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平息西藏叛乱》[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181页。

^② 《周恩来同达赖喇嘛谈话记录》(1956年12月30日),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③ 达赖喇嘛著,丁一夫译,李江琳校:《我的土地,我的人民》[M],台湾:图博之友会,2010年,第138页。

^④ 《周恩来同达赖喇嘛谈话记录》(1957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第152—153页。

^⑤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员之间的合作计划最终也定下来了。随后,他们编写了一个密码本,一式两份:一本留在噶伦堡,另一本由噶伦饶噶厦带回西藏。同时,达赖喇嘛还留下了代理噶伦宇妥,作为与“事业会”的联系人员。这就说明,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前,就默许了并暗地开始支持“事业会”的分裂活动。围绕在他周围的最亲近的、能控制消息渠道、能直接影响达赖喇嘛决策的卓尼钦莫帕拉、噶厦官员等都与境外的“事业会”联系密切,互通消息,并策划局部反抗等分裂活动,为后来达赖喇嘛出逃埋下了伏笔。

达赖喇嘛返藏后,中央确定了“至少六年不改”的方针。但是对达赖喇嘛来说,推迟6年、12年,或者更长时间,最后中央还是要进行民主改革的,依然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和政教特权,康区的改革更是让他心惊胆战,他开始默许西藏的局部叛乱,他知道这些叛乱与境外分裂势力紧密相连,当然他也希望借此能让中央再行让步。

达赖喇嘛返藏,使西藏的全面叛乱爆发延缓了两年时间,也让西藏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央的态度和诚意,为中央全面平叛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2、达赖喇嘛印度之行对“事业会”影响颇大

首先,达赖喇嘛访印强化了“事业会”这一分裂组织在噶厦中的半官方的地位。达赖喇嘛对“事业会”的认可态度,客观上密切了“事业会”与噶厦的联系,“事业会”成为噶厦的组成部分,更是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的秘密办事机构。简单讲,“西藏商务代理处”实际上就是噶厦设立在噶伦堡明面上的一个非正式办公机关,暗地里的机构则是“事业会”。“事业会”的三位领导人之一——洛桑坚赞,1953年底就被噶厦任命为“西藏商务代理处”两代理之一。夏格巴1957年2月3日的日记内容反映出噶厦与“事业会”的紧密勾连。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的代理噶伦宇妥说“由于我确实是为噶厦工作,正式加入你们的组织(‘事业会’)不妥。但如果你们就有关事宜向我咨询的话,我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如果你们不得不向联合国请愿的话,我可以提供噶厦的印章及(官方)证明文件等”^①。

其次,达赖喇嘛访印,促进了“事业会”与印度政府的密切联系,使“事业会”更加组织化、正规化。在达赖喇嘛访印前,“事业会”仅仅是一个松散的、流亡藏人的非法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国际上宣传所谓西藏处境,争取同情与支持,但是始终没有一面“旗帜”来号召和团结流亡藏人。美国、印度等国家并没有看到达赖喇嘛的任何举动,仅仅是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的言行,因此他们对于“事业会”是否能完全代表达赖喇嘛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达赖喇嘛到印度后,虽然没有对外承认这个秘密组织,但是在内部是承认了的。“旗帜”的默许让“事业会”师出有名,更加正规化和组织化。美国中情局、印度开始相信“事业会”是可以代表达赖喇嘛的。

再次,达赖喇嘛访印,促使“事业会”的性质也从一个以宣传影响世界舆论为主的流亡组织转变为一个以从事政治活动、武装斗争为主的组织。纵观《夏格巴日记》,从1956年开始,“事业会”决定开始游击战争并计划武装占领亚东等地,为此希望印度政府给他们提供武器、炸药等;康区叛乱后,“事业会”认为“必须得到武器和经济帮助”^②;“事业会”还曾多次要求美国援助资金、武器、爆破装置的使用培训等等^③。达赖喇嘛访印后,“事业会”与译仓、噶厦、伪“人民会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1957年,在反华分子的策划下,西藏开始出现局部叛乱,1959年,全面叛乱发生,达赖喇嘛秘密逃往印度。

3、达赖喇嘛印度之行是中印关系由“热”变“冷”的分水岭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主张不结盟运动,倡导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并开始积极寻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新的外交格局。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西藏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央洞察了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心态,确定了“联印牵英制美”的外交方针,一箭三雕,促使西藏和平解放。印度政府为保留在西藏特殊利益,主动承认新中国,随后中印多次“照会”,印度表示不寻求“新的特权地位”,但却希望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1954年4月29日经过多轮谈判,《中印关于中国

①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429.

②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198.

③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p. 205.

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写入序言之中,但是中国政府并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失望的尼赫鲁开始允许印度情报局与噶伦堡的“事业会”成员秘密联系,并默许“事业会”进行有限度的分裂活动。此时尼赫鲁虽然失望,但是依然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比印度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更为重要,公开场合中印关系依然比较友好,只是暗地里开始积极插手西藏事务。相对来说,这一时期印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比较“热”的。

但是眼见康藏、青藏公路贯通,达赖喇嘛进京参加国事后积极筹谋改革旧西藏,西藏正有效地融入共和国建设的步伐之中,尼赫鲁彻底慌了,开始积极策划1956年达赖喇嘛访印事件。可见,印度所有的措施都“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①。印度政府非常满意最终促成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在中国控制的范围之外见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处于分裂势力的包围之中,对达赖喇嘛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印度一直继续默许噶伦堡的“藏独”活动,图谋拉拢达赖喇嘛,分化西藏上层,访印之行成为中印关系由“热”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

从印度力促达赖喇嘛访印这一年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宗教访问,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甚至还有文化斗争。我国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和班禅赴印访问的态度,充分向外界展示了我国宗教自由政策,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从而打破所谓强权的谎言,而且也很巧妙地维护了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印度政府依然不满足。返藏前,印度政府希望促成达赖喇嘛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进一步分化西藏上层、破坏中共对西藏的上层统一战线。1957年12月6日,达赖喇嘛向尼赫鲁发出邀请函访问西藏。1957年2月,在锡金境内,达赖喇嘛又写信给尼赫鲁,感谢了尼赫鲁的盛情款待,并再次提出邀请,希望尼赫鲁近期能够访问西藏。对此,中央果断拒绝,这是对印度插手西藏事务的一种警告。至此,中印关系在西藏事务上的分歧已经表面化,达赖喇嘛印度之行,成为中印关系由“热”变“冷”的一个分水岭。

【作者简介】 李荟芹,女,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咸阳 712082)

① [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71年,第67页。